

《负喧闲语》：周氏百年的治家宝训

杨天

《负喧闲语》为晚清实业治国代表人物、李鸿章重要幕僚周馥所撰，共两卷。据序中所言，此书是周馥为解孙儿周叔弢之惑，“就书史所载，见闻所及，引伸之以广其义，随笔记载”而成，他寄厚望于子孙“好学深思，自然知识日充，事理通贯，即能谨守数语，终身不失，亦必受用良多”。该书是周馥为教育子孙后代而撰写的散文体家训，分别从读书、体道、崇儒、处事、待人、治家、葆生、延师、婚娶、卜葬、祖训、鬼神等十二个方面出发，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建议，约束子孙的行为。周馥之后，东至周氏家族一直人才辈出，长盛不衰，《负喧闲语》作为治家宝训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存心公正，虑事详审

周馥在《负喧闲语》处事篇中，开篇即引用《论语》《中庸》等圣贤之说，道出了虑事周详审慎的重要性、全局性和前瞻性。他说，要有为国为民的责任观，有一颗没有偏私的公正之心。干事，要先审此事于国有益否？于民有益否？进一步还要考虑此事能否持久，是否有弊端，是否有多方掣肘，怎么防备？政策怎样才能真正惠民？这些都要了然于心，要下狠功夫做足功课。此外，做事还要防孟浪之举，防万一之败，败时如何应对才不致进退维谷、不易收拾等。李鸿章评价周馥：“周某用心极细，虑事最精，且廉正有魄力，非时人所及也。”此言不虚。

光绪廿八年七月，周馥接任山东巡抚，初上任的六个月中，五个月都有河工的考察活动。“山东黄河，无岁不决，或一岁数决”，周馥希望治理的成效能维持得长久一些，所以各处漫口都实地勘察。在《自著年谱》中，周馥对利津薄庄漫口作了较详细的记述：因前任抚臣“不谙治河之法，随湾就曲立堤，水流不畅，尾闾更甚”，而薄庄“正当其冲”。周馥认为只有对下口河道徐图改直，才能使尾闾通畅，杜绝隐患。遂花费三十万两为村民择地迁居，移家建屋，后来河水大涨，薄庄漫口成一片汪洋，所幸周馥谋划筹备，民皆迁居，未伤一人。

在任山东巡抚期间，除了治理黄河，周馥对山东段的运河治理也同样卓有成效。他通过整顿运河吏治、调整运河关税、堵筑修补漫口、完善残破堤坝、试办运河工巡营等系列有效的治理方法、措施，基本解决了运河存在的问题，不仅使运河经济逐渐恢复繁荣，也推动了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。后人评价他“功德在民，尤以河工为最巨”。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周馥



周学熙捐修迎江寺(振风塔)碑刻

务实、审慎周全、事必躬亲的行事原则有极大的关系。清帝赐予谥号“愬慎”，“愬”的基本含义是诚实、恭谨、谨慎，由此可窥其生前虑事详审之风范。

惟义是视，勇往图之

周馥教育子孙：“一身行止，惟义是视，从不趋利避害。当患难，可辞而不辞；遇富贵，可就而不就，此心坦如也。”“违义而荣，不如守义而困。”周馥为何如此重义？细察周馥一生，自少到老，未尝一日废书。他爱读什么书目？李鸿章在周馥营帐中看到“几上皆宋儒书”。《行状》中对此也有记录：“笃持宋学，以朱子为归。”他要求子孙亦是“总以专重修儒学为主，不可邪趋旁骛”。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周馥重“义”。“义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，朱熹指出：“义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也。”儒家之义强调主体性和实践性，可内化为人的思想品质，成为个人修身的价值取向，又会外化为人的实践行为，具有现实操作性。

周馥将“义”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“遇有益于国、于民之事，莫不勇往图之，未尝一日偷安”。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，周馥被令赴前敌总理营务处。当值牙山兵败不久，有朋友劝告他：此役必败无疑，你去干什么？周答：“明知必败，而又不可辞也。”随即奔赴前线，来往于辽阳、营口、鸭绿江之间。周馥在关外负责后勤保障，这本不是什么好差使，前线若打了胜仗，功在将士，若打了败仗，将领却好诱过于后勤，后勤之人动辄得咎。期间，李鸿章调他进关，他本就追随李鸿章多年，应调顺势脱离困境，也算

明正言顺。但是当诸将领挽留他时，他竟答应了，说：“军务一日未平，我一日不离营。”周馥《自著年谱》中记载，整个战事期间，他集军械、粮饷、转运、采买于一身，艰困百折，掣肘万分，但是自始至终不曾使军需缺乏。所以战事虽败，没有将官将战败原因推委于周馥。

分寸合度，识量宽和

周馥主张“处事之方，随地随时而变”，认为处事不能听从旁人的阿谀怂恿而轻举妄动，不能循规守旧如钝汉，不能墨守成规，而要顺应外界的变化审时度势，深谋远虑，积极应变。

这种变通能力在周馥的四川布政使任上有鲜明的体现。当时，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势头汹涌，朝廷也向各地发出了支持义和团、打击教民的朝旨。很多官员劝巡抚效仿外省屠杀传教士，周馥坚决反对，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劝说巡抚对外国人采取保护措施，使四川的外国人保住了性命。在清廷的一再重压之下，周馥对待传教士、教民问题尚能够有独立、清醒的认知，实属不易。之后不久，周馥调任直隶布政使，处理外事同样有自己的原则，他与盲目偏激的排外思想不同，既不是一味地欺压外国人、教民，也不是一味地讨好、卑躬屈膝、出卖本国利益。他能客观地分清是非，秉公处理，同时坚决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。因为他的坚持，久之，外国人也都折服于他。

立志以坚，勤力有效

周馥在《负喧闲语》中强调“立志”的坚定性以及勤奋的重要性。“大凡今世聪明，遇事亦见得几分理路，总是立志不坚，苟顾眼前。如为士、为农、为工、为商，岂不知勤力有效？初尚奋勇，旋即气馁中辍，以无恒心故也。”《清史稿》记：北洋海防的建设延续了二十年左右，周馥始终处于决策的核心层，从这项建设的开始到结束，兢兢业业，集中全部精力于这项事业上，协助李鸿章建成了第一支近代化海军，形成了以北洋为重心的近畿防务体系。在旅顺船坞建设工程中，从选定承包人、参与施工指挥到工程完成验收，周馥整整为之奋斗了五个春秋。他无畏艰险，多次到旅顺、大连湾、威海卫督察船坞和炮台工程，“出入风涛险塞之区，坚台坞，历水操，终岁奔驰，不遑启处，其瘁为也甚矣”。以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，要在荒岛上建一座军港，加之周本人并不谙熟船坞工程建设，其困难可想而知。但正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，周馥等人硬是凭着一腔热

忱和认真负责的态度、坚忍不拔的毅力，将中国传统的河工经验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机结合，一步步向立下的目标靠近。1890年秋天，旅顺船坞工程得以竣工，规模宏阔，实为中国坞之冠。虽然甲午一战北洋海军溃败覆没，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未能济事，但这不能归罪于海军海防建设不力，而是由清朝政治上的腐败所造成。北洋海军的成军为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最突出的成果。海防建设从无到有，是中国近代史中求自强、御外侮的洋务运动的一个高潮。周馥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按律合礼，情礼兼到

周馥向子孙强调，行事要按律合礼，还要领会情与礼之间的关系，追求情礼兼到的道德境界，他言处事“不外按律合礼、揆时度势，尤以顺人情为主，不顺人情，虽合律礼，不可为也。”意思是，处理事情不外乎要守律法，合礼制，要审时度势，尤其要顺乎人之常情。

据《周愬慎公自著年谱》记载，同治三年甲子（1864）三月，李鸿章带兵攻打常州，在青阳镇俘虜千人后，对周馥说：“是皆阵前败降者，闻各军所俘多杀之，尔为我戮其半。”李鸿章的意思是其它各军对降俘都是一杀了之，你替我杀掉一半。这在李鸿章想来算是够仁慈了，但是周馥想，这些人都是降虏，怎么能全部杀掉呢？于是，他连夜找来十几个理发匠，准备好热水，对俘虏一一提审讯问后，只杀掉了清军投降过去的和顽固的太平军共三十余人，其余一千多太平军，因披头散发当即理发留辫，归于礼制，并“各给米一斗遣之”。审讯完此处后，另外还有数百个俘虏本也归周馥讯办，却被“某营官尽杀无遗，幼童亦被戮”，周馥自述“余痛恨之”。当时的清军对太平军积怨已深，往往攻克一地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尽行屠戮，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，周馥却有自己的独立判断，不是一味地唯唯诺诺遵从上级命令，这与他尊崇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，并一直读书不辍、修身体道是分不开的。

周馥之处事，除了上述所列，还有诸如“处一己之事在让，处一家之事在和、在俭，处国家之事在安而不扰、在固民心顺民意”等，《负喧闲语》中均有阐述。周馥以己示范，用阅尽世事的智慧之言为后世子孙提供了为人处事的“教科书”，其中蕴含的道德理念、价值判断传承下来，自然就形成了周氏家族优良的家风，历经周氏代代传承、发扬，终成人才辈出、书香数代绵延的望族，对今人亦有启发与借鉴意义。